学習時報

第747期
2014年7月28日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
报名题字：江泽民

STUDY TIMES

网址：www.studytimes.cn 周一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37 代号：1-267

重要言论

对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仅是政治要求，而且是政治纪律。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是全面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方位向党中央看齐，做到表里如一、知行合一；必须是具体的，不能光口头讲讲，要落实在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上；必须是坚定的，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习近平

绝不让甲午的悲剧重演

——沈阳军区政委褚益民上将答本报记者问

高层访谈

□本报记者 李 红

编者按：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5个主要战场有3个在沈阳战区，其中辽东陆战是日军首次大规模入侵我本土，在甲午战争期间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辽东陆战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军在战斗力建设上的巨大差距。深入研究甲午战争特别是辽东陆战的教训，对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特别是军事斗争准备有很强的启示作用。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沈阳军区政委褚益民上将。

军不思战、麻痹懈怠 缺乏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精神支撑

记者：褚政委您好！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习主席指出：“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发展进程，加深了民族苦难，也激励了民族觉醒。我们要用这段历史警示国人，教育官兵，勿忘国耻。”沈阳军区处在当年甲午战争的主战场，您对于这场战争一定有很多思考。请您跟我们谈谈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褚益民：很多人都在思考当年那场战争。在我看来，甲午战争之败，首先败在军不思战、麻痹懈怠，缺乏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精神支撑。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队的主体实践活动，是军人的天职。分析甲午战争清军的备战情况，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和平积习”充斥着清军上下。

不思战，看不到战争危险。30多年洋务运动造成的繁荣表象，使清军对国家安全形势产生严重误判。李鸿章本来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1874年就率先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但随着北洋海军成军，李鸿章开始盲目乐观，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殊不知，强军备战就像龟兔赛跑，我们在进步，敌人也没有睡大觉。日军对这场战争蓄谋已久，先后8次扩充军备，派遣大批间谍到中国刺探情报。对这样一个磨刀霍霍的恶邻，清军一些高层却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不务战，不谋打仗的事。多数清军都是操练废弛、精神萎靡，旅顺军港内驻泊的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甚至从朝鲜走私人参、装货载客搞“创收”。平时不想打仗的事，战时就绷不紧打仗这根弦。大连庄河市的花园口地区这样一个海防要地，清军竟没有设防，日军24000多人、2700多匹军马，登陆时间长达14天，驻守辽东半岛的7万多清军没有任何反应。鸭绿江防之战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关键之战，日军在丹东九连城段用了一晚上时间架设浮桥，清军竟毫无察觉，致使日军大部队渡江。

不知道为谁而战，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是任何一支军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精神无源、精神无魂，再靠物质激励也无济于事，甚至会起反作用。应当说，清军的生活待遇是比较高的。国家花了大笔银钱养着军队，军队应该更多想的是如何报效，但多数清军把当兵作为谋生的手段，平时为了发财，打起仗来就是为了保命，朝鲜牙山之战、平壤之战、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一些清军望风而逃。保国安民是军队和军人的本分，而清军却不知道何为国家、何为民族，战场上各自逃命就不足为奇了。

一盘散沙、各自为战 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

记者：的确，和平积习下的清军缺乏保国安民的理念，就难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按理说当时清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不输于日本，最终却溃不成军。这支军队究竟是怎么了？

褚益民：这正是我要说的甲午战败的第二个原因：军队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统一的组织指挥是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最大限度发挥军队整体作战能力的有力保证。没有统一的号令，再多的军队也是乌合之众。

从清军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是派系林立，兵为将有。晚清兴办洋务运动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和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海军，曾国荃、左宗棠的湘军，还有八旗兵、绿营兵、练军等，就连李鸿章的淮军也分为毅军、铭军、盛军、庆军等十多种，“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战场上有时不仅坐视不救，反而相互掣肘。海军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相互间没有任何策应，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激战时，其他几个舰队都以没有铁甲舰为借口不肯增援。在他们眼里，小团体的利益总是至高无上，国家和民族大义却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是互不协同，各自为战。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折，十根筷子坚如铁，指头再硬也敌不过攥起来的拳头。清军海陆之间、陆陆之间，经常出现孤军奋战的场景。金州与大连湾地理上连为一体，可以说是唇亡齿寒，日军进攻金州前，金州的守将连顺跪下来求大连湾的守将赵怀业出兵，但赵怀业按兵不动。旅顺要塞花费几千万两白银，经营十几年，号称“东亚第一要塞”，每座炮台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当时驻守在旅顺口的清军达33个营15000多人，有7个统领，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在二龙山炮台首先遭到日军一个旅团3000多人攻击情况下，附近的多处炮台既不以火力支援，也不出动兵力策应，20多座炮台一天时间就被日军占领。侵略者的屠刀能够高高举起，正是因为军队打不了仗。

作战理念落后、训练水平低下 缺乏应对近代战争的制胜之道

记者：除了派系林立、各自为战，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褚益民：是的。这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就是作战理念落后、训练水平低下，缺乏应对近代战争的制胜之道。甲午战争是近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的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战思想和训练滞后，可以说是一支拿着新式枪炮的古老军队。

奉行消极防御的战略。不管是海军还是陆军，都是建立在“守”字上。北洋水师被称为山寨版的海军，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海防建设不过是在海岸线“修长城”。陆军一味龟缩在城池中、工事里，分兵把口、守株待兔。战争法则就是这样，主动出击则处处主动，被动挨打则处处挨打。在整个甲午战场上，清军主动寻找战机的例子少之又少。

战法训法普遍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据资料记载，清军同日军交锋，总喜欢打堂堂之阵，进攻时基本上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式战术，在日军步枪阵前损失惨重；防守时只注意正面防御，没有防御纵深，也没有预备队。鸭绿江防之战、田庄台保卫战，日军都是从翼侧率先突破的。在武器的使用上也是如此，清军在射击时从不用跪射、卧射，而且基本不瞄准，子弹多从日军头上飞过。观念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问题，仅仅靠先进的武器装备是解决不了的。

操练演习流于形式。古人讲：“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实，与不练同。”旅顺地区清军虽有15000多人，但其中近万人是几乎未经训练的新兵，还有3000多老兵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北洋舰队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李鸿章要看实弹射击，“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就派人藏在靶船上，专等舰炮一响，便点燃船上的炸药以示命中。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但唯一无法欺骗的是敌人，当由操场走向战场时，“花架子”就会被打出原形。清军5次反攻海城，投入兵力超过6万，而日军仅7800多人，但每次反攻都以失败告终。

治军不严、畏战怯战 缺乏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军纪军风

记者：“一支拿着新式枪炮的古老军队！”光是想象一下，就让人为那样一支军队扼腕叹息。您刚才讲到了清军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这样一支军队，其军纪军风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褚益民：是的。甲午战败的第四个原因正是这支军队治军不严、畏战怯战，缺乏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军纪军风。战场既是武器和战术的对抗，也是作风和意志的较量。一支没有严明纪律、英勇精神的军队，未上战场，胜负已决。甲午战争中，日军哪一仗都没有十足的胜算，但清军却常常是一触即溃，充分印证了这一战争铁律。

军纪废弛。“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管理松懈，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有的官兵违规违纪，从上到下不是严加惩处，而是层层庇护。纪律松一尺，作风就会散一丈。北洋海军兵勇在舰炮上晾晒衣服，炮筒上一摸一把黑灰。鸭绿江防线失守后，清军逃兵沿途烧杀掠抢，搞得当地百姓鸡犬不宁。甚至谎报军情这种军之大忌，在清军中也司空见惯。黄海海战，北洋海军损失四艘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上报“我失四船，日沉三船”。

贪腐成风。在清军内部，腐败行为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上行下效，毫无顾忌。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用于慈禧修颐和园，导致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许多管带以权谋私，侵吞训练和保养船械等款项，致使战斗技术性能严重受损。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对军队来讲，腐和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旦贪腐成风，就离打败仗不远了。

（下转第7版）

时势专论

治贪也要治“混”

□本报特约评论员 熊若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动真格，打硬仗，查处了20多个曾任省部级及其以上职务的贪腐官员，全社会为之震动。反腐败利剑高悬，铁扫帚所到之处，扫除了顽瘴痼疾，营造了良好政治生态，取得了人民满意的实效。

反腐败对于党和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在气势如虹的反腐败斗争态势面前，也有少数领导干部认为“当干部好处不多了”“做事就容易出事”，滋生了“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混日子思想，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门好进、脸好看，礼不收、事不办”的现象。为官不为、敷衍了事，成为了作风建设中新出现的突出问题，需要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混日子”情绪的背后是什么？是为什么做官的问题，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忘记了这样的宗旨，那么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对自己入党初衷已经背离，这样的思想情绪是很不健康甚至危险的。君不见那些出了问题的领导干部，反思腐败之始，往往就是最初一种不良情绪驱动“出格”行为吗？管住自己与党的宗旨不符合的不良情绪，应该是领导干部自我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领导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清正廉洁是对自己的一种底线要求。我党执政60多年来，培育了许多孔繁森、杨善洲式的廉政模范。但是，十八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内，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被查处的数量已超过1%。这个数字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多么惊心动魄，多么振聋发聩。每一位共产党人，尤其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内心深处一定要筑牢不贪腐的思想防线；一定要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家的人，管好自己的责任领域。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清醒地知道，反腐败、正“四风”并不是对领导干部们如何过分的要求，而是底线性的要求。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连这些底线都不能坚守，怎么配得起“人民公仆”四个字？

保持奋发有为，是领导干部应有的、长期保持的精神状态。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执政，既不能贪，也不能混。如果领导干部对党的事业无所用心，在重要的岗位上无所作为，说到底也是一种消极渎职行为。这样的行为也是党和人民所不允许的，尤其是一旦在工作上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更应该严肃地追究责任。因此在党纪国法上加大对为官不为者的问责力度，是我党一种必然的制度和治理上的选择。如果放任为官不为、敷衍塞责之风蔓延，就会严重阻碍中央政令畅通，就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就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建立健全惩治为官不为的规章制度，进一步严明纪律，严格管理，严肃问责。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及早振作精神，投入到积极主动的工作中来。

对于每位领导干部来说，廉政是必须的，勤政也是必须的。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两者相辅相成，统一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到这两点，坚守这两点，在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的同时，坚持做人做官的底线，那么一个领导干部就会在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同时，得到自己的成就与利益，自己的事业就会同党和人民的事业一起发展，获得人生的辉煌。能如此，应该是每个领导干部追求的人生境界。

中国海洋战略“内外兼修”

□车海刚

近日，有几件重要的涉“海”大事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6月3日和23日，国务院相继批复同意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这两个新区由此成为第九、第十个国家战略层面的新区。两个新区的总面积逾4000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在十个国家级新区中位居前列。

国务院在批复中明确要求，“把建设青岛西海岸新区作为全面实施海洋战略、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举措，为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发挥积极作用”，西海岸新区要“努力发展成为海洋科技自主创新领航区、深远海开发战略保障基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先导区、陆海统筹发展试验区，为探索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新路径发挥示范作用”。这是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之后，又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对于大连金普新区，批复虽未定位其为海洋经济新区，但也有关涉此方面的内容。

联系到今年以来新设立的四个国家级新区，有两个位于东部沿海城市；再加上此前设立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浙江舟山群岛、广州南沙等沿海新区，国家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视可窥一斑。

另一则引发舆论关注的新闻是，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到访同一个国家——希腊。两位中国领导人均与希方谈及海洋合作问题，尤其是两国在有“欧洲南大门”之称的比雷埃夫斯港的合作项目。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说，“中希拥有古老的海洋文明，致力于海洋开发。明年是中希海洋合作年，希望双方为构建和平安宁合作的国际海洋秩序作出贡献”。李克强则在访希期间出席了中希海洋合作论坛并发表演讲，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海洋政策。

有观察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动向背后蕴含的“全球性战略意义”。一家名为智谷趋势的民间智库分析称，在海洋经济成为当前区域政策重要方向的同时，中国海洋战略的全球布局正在成型，决策层对海洋经济战略的考虑是统筹国内与国外，将两者“打通”。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海洋战略由浅入深、由内及外的演变过程。

中国是个陆海兼具的国家。作为海洋大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海域和3.2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其中大陆海岸线长1.8万公里）。然而，中国远不是一个海洋强国；在传统上，甚至一直被认为是个大陆国家。无论是政府和国民的海洋意识，还是海洋经济的规模和质量，均与一些海洋强国存在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逐渐进入快车道。2003年，《全国海洋经济规划纲要》发布，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海洋经济”概念。2011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专章述及“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3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在海洋经济的区域布局上，从2010年选择山东、浙江、广东三省作为试点，迅速发展到11个沿海省份全面开花。截至2013年，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达到9.5%，接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2015年占比达到10%的目标。

走向“深蓝”，发展海洋经济，既是对中国自身历史和先发国家经验的总结与借鉴，也是我们赢取未来制高点、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2001年，联合国在正式文件中指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海洋是我们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后空间和资源宝库，人口及经济的趋海移动是一个世界性趋势。自然，中国的海洋战略离不开全球视野及国际合作。

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东南亚期间，首度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此设想与同年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并称为“一带一路”。构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无疑是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体现。但亚太地区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特别是南中国海等地区的争端，也使这一战略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中国加强与欧洲国家的海洋合作，被认为是一种适时而智慧的战略调整。

可以说，通过十余年来的不断深化、提升和完善，中国的海洋战略“内外兼修”、日益成熟，通往十八大所确立的“海洋强国”目标的路径也愈来愈清晰。

观察员

责任编辑：李玉梅
E-mail:studytimes1@126.com